责任编辑：张丹丹 E-mail:zhangdandan7315@163.com 电话：010-62807315
758103815@qq.com

为什么要提高领导干部的道德引领力

□靳凤林

党的十八大报告在谈及党的建设问题时，首先强调党员干部要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明确提出：“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模范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做社会主义道德的示范者、诚信风尚的引领者、公平正义的维护者、以实际行动彰显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并一以贯之地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视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首要原则。回顾我们党近几年的历史，我们会看到，早在十七大修改党章时，就专门增加了加强党员领导干部道德修养的内容，十七大之后，我们党又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了“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创先争优”等活动，2011年11月中组部专门下发了《关于加强对干部德的考核意见》的文件，国家公务员局出台了《国家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大纲》。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和职业道德已成为近年来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加强党员领导干部的道德建设有着十分迫切的现实意义和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首先，领导干部的道德水平是影响和制约个人成长和发展的重要因素。我们党历来把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视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首要标准，尤其是把道德素质放到至关重要的位置来看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做官必须先做人，而人之为人的本质就在于人的德性，一名干部在德才无法兼备时，有德无才者和有才无德者相比，后者对社会的危害更大。比如：一名法官只要他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勇于担当起公平正义维护者的角色，即使他对某些法律条文缺乏深入研究，在其办案过程中，也会本着公正合理的原则去处理各种案件。相反，如果这名法官品质恶劣，习惯于吃请受贿，缺乏最基本的公平正义感，那么，即使他对具体的法律条文非常精通，他也会想尽办法寻找法律的漏洞，尽可能去钻法律的空子，为行贿者开脱罪责，乃至帮助其制造假证或湮灭证据。不仅如此，我认为一名领导干部能否长期有效地做好本职工作，除了依靠组织赋予其所掌管的人、财、物等各种权力因素外，更多的时候要依靠非权力因素，包括通过自身的品行、德性和人格魅力去感召群众并开展工作，因为任何一名干部在一个行业、地区、部门工作久了，其上下级同事和广大群众对其道德品行都会有一个基本的评价，如果他总是依靠玩弄权术或耍小聪明的方式去工作或生活，只能取胜一时，不能取胜一世，古人讲“小胜靠术，中胜靠智，大胜靠德”就是这个道理。

其次，领导干部的道德水平对公民道德建设发挥着定向、推动、示范和凝聚效用。只有党员领导干部在道德建设中起到率先垂范的作用，整个社会才能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从而有力促进公民道德建设。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普通公民的失德行为仅涉及个人的品行问题，比如一个普通公民在公共场所的不当行为（随地吐痰、大声喧哗等）也会损害一个城市的社会公德形象，但其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和范围相对较小。相反，领导干部掌握着公共权力，他的失德或败德行为会导致其所执掌的各种规章制度丧失正义力量，加之，领导干部公共权力的滥用和腐败来自其所熟悉的制度内部，具有规避和抵抗制度约束的有利条件和巨大能量，因此，其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将波及制度约束下的每一部门或个人，乃至使相关规章制度形同虚设，从而彻底破坏掉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道德形象。正因如此，孔子在《论语》中讲：“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老百姓形象地比喻为“宫中好细腰，民间饿死人”，在有着“以吏为师”深厚历史传统的中国古代社会，官风对民风的影响是如此之大，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代社会，领导干部的道德水平对公民道德建设所发挥的定向、示范、推动和凝聚效应同样如此。由之，我们说选拔任用一个好的干部就是树立起一面好的旗帜，他不仅可以带出一批好的干部队伍，更能深刻影响一个部门、地区、行业的道德风气。

再者，领导干部的道德风尚直接影响到党和政府的执政合法性。所谓党和政府的执政合法性主要是指党与政府系统的组织结构和制度安排及其所制定和实施的各项公共政策，是不是、为什么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获得社会成员发自内心的忠诚和支持，其所涉及的本质问题是人民权利（Right）和政府权力（Power）的关系问题。自近现代以来，学界对政府合法性问题的认识存在不同的看法，如：韦伯认为政府合法性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建立和培养人民对其存在意义的普遍信念；阿尔蒙德认为如果韦伯所讲的信念是政府强加到人民身上的，那么它就具有了意识形态上的欺骗性特点，只有将人民的信念同真理性结合起来，这种合法性才具有可靠的心理基础；哈贝马斯则认为政府合法性的基础不在于其能否被人民认同的“事实”，关键在于政府合法性赖以存在的价值标准的合理性。撇开上述观点的差异性不谈，单就其共同性而言，他们普遍认同人民主权乃是政府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从这种意义上讲，政府的一切权威都是相对的，政府权力的合法性只能来自人民的同意，如果政府机关及其掌权者在实际工作中违反了人民当初委以其权力的根本目的，损害了人民原有的天赋权利，人民就有权团结起来废除或推翻这个政府，重新设立或组建自己真正认可的新政府。当然，党和政府执政合法性能否得到人民的认可取决于诸多因素，诸如：领袖人物的神秘魅力、取得革命胜利的成果、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等。但必须指出的是，任何执政合法性必须以合道德性为前提，因为道德是法律的基础，不合道德的法律迟早会被废除。例如：如果巨大的经济发展成果得不到公平正义的分配，同样会危及党和政府的执政合法性，而这里所讲的“公平正义”本质上是一个道德伦理问题。正因如此，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公平正义的维护者，并把我国财富分配制度改革和民生建设工程列为未来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实际上普通百姓对党员领导干部是否具备公平正义的道德人格和道德品质的评价，最能直接地反映出执政党的社会形象和人心向背，并最终影响到其执政合法性。

最后，提高领导干部道德水平是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引领人类文明发展新方向的需要。中国的社会文化传统深受儒释道政治伦理观念的影响，强调“重义轻利”的价值观，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取向，崇奉“以和为贵”的处世哲学，具有“和而不同”的宽容精神。中国共产党人应在充分吸收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中庸和谐、礼仪之邦等合理性道德因素基础上，认真借鉴西方社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走出一条人类和平发展的新型现代化道路，从而引领人类走向和谐世界的新境界。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哲学部）

对“腐败越反越多”说法的辨析

□李志昌

十八大以来，中央采取强力措施反腐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查处了大量腐败案件，取得显著成效。对这个现象，有些人不能正确认识，以至当前社会上流传一种说法，叫做“腐败越反越多”。这种说法，如果不深入思考分析，感觉上还真是这样。之所以产生这种说法，肯定是有原因的。对这种说法，不能简单指责，要分析原因，澄清人们的模糊认识。

首先要分析为什么人们会产生“腐败越来越多”这种感觉。同过去相比，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个主要特征就是从“封闭”走向“开放”。

从技术角度看，在过去，由于信息技术落后、交通不发达，信息传播、人员流动受到极大限制，人们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自己不知道别人的事情，别人也不知道自己的事情，这里的人不知道别处的事情，别处的人也不知道这里的事情。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往往就在很小的范围内传播，其他地方的人很少知道。现在信息技术先进、交通发达，信息传播速度快、范围广，人员流动量大，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很快就在全社会甚至全世界传播，大家都知道。现在信息传播达到了“实时传递”的程度，一个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其他地方同时就知道了，如“实况转播”。现在，每天人们都可以从各种媒体上了解到，这里那里查处了各种腐败问题，就会觉得腐败问题越来越多。当然，这里并不是说现在腐败问题不多，而是指出由于信息环境的变化，现在人们对腐败现象了解、知道得越来越多。“实际上存在的多”和“人们知道的多”，这是两回事。即使实际上存在问题很多，但人们不了解、不知道，也会觉得问题不多，而一旦广泛传播，大家都知道，就认为问题太多。

从政治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民主、公开、透明程度大大增强，使人们对社会问题有充分的了解。在过去，对于消极现象、社会问题，特别像腐败这样的社会问题，在传播上是加以限制的，人们很少了解、极少知道。这就使人们觉得社会问题很少，天下太平。过去有这样的事情，两个相邻的单位，一个单位的领导犯错误被撤职了，过了一段时间，另一个单位的人去这个单位办事，要找领导，才知道领导被撤职了。人们都处在一个相互隔绝的环境中，相互的情况不了解。现在，不回避消极现象，不掩盖社会问题，敢于揭露，敢于公开，加上传播手段先进、多样，人们对各种社会问题、消极现象了解、知道得很多。从实际情况看，人们对坏事情比对好事情更关注，坏事情比好事情传播得更快、更广泛。

从以上两个方面分析，我们处在一个更开放、更公开、更透明的社会，这是社会的巨大进步。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信息传递迅速、传播广泛。消极现象、腐败问题一旦被揭露、被发现，社会上就会广泛传播。

“腐败越反越多”这种看法，在于混淆了原因和结果、本质和现象的关系。这里要搞清楚，“反腐败”不是造成“腐败越来越多”的原因。“腐败现象”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实际存在的腐败现象，一种是被揭露出的腐败现象。实际存在的腐败现象，有些还没有被揭露，人们当然不知道，而人们知道的是被揭露的腐败现象。腐败问题被揭露得越来越多，社会上传播的就越来越多，这就会使一些人产生一种错觉，好像这些腐败现象是由于“反腐败”造成的。实际上，正是因为反腐败的力度越来越大，被揭露的腐败问题才越来越多，就是说，人们知道的这些腐败现象，是被揭露出来、被查处的腐败现象。因此，反腐败力度越大，被揭露的腐败问题就越多，而不能说反腐败造成腐败问题越来越多，不能把“反”作为“多”的原因。

“消极腐败现象多”和“腐败越反越多”，这是两个不同的看法，前者是客观正确的，而后者是错误的。“消极腐败现象多”是从产生、存在的角度讲的，它反映了客观事实。十八大报告指出，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从客观上看，消极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我们不回避当前消极腐败现象的产生、存在，还是一个较为严重、较为普遍的问题。但是，不能把消极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归结为“反腐败”。按照“腐败越反越多”这种说法，可以推论出“不反腐败，腐败就会减少”这样荒谬的结论。事实上，不反腐败或者反腐败力度小，会造成两种结果，一是实际存在的腐败问题不能被揭露出来，二是腐败问题会越来越多。

减少消极腐败现象，最根本手段就是反腐败。消极腐败现象不会自然减少，不反还会更多。当然，反腐败不仅仅是揭露和惩处，还包括预防。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坚定不移反对腐败，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对于不好的现象，一是要防止它出现，二是出现了要加以消除，要坚持预防为主、预防优先。我们都知道一个常识，坏事情出现了，当然要处理，但最好的办法是避免坏事情出现。在反腐败问题上也是这样，既要重视揭露、惩处，更要重视预防，这样就会使消极腐败现象越来越少。

（作者单位：云南省楚雄州委党校）

想起了“见官低半级”

□赵 畅

范敬宜刚参加工作时，一位前辈送给他“见官低半级”这句话。当时，做记者的他很不以为然，经历多年的人生风浪后，他终于悟透了这句话的真正含义：“‘见官低半级’，不是说要你在当官的人面前丧失人格，卑躬屈膝，而是说，无论采访谁，都要把人家放在比你高半级的位置去对待、去尊重。这样，你才能同采访对象打成一片，才能抓到活鱼。”

做记者确乎要记住“见官低半级”这句话，因为只有你“低半级”，采访对象才能看到你的诚意，感受到你对他的尊重，因而，人家也才会“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用同样的一份诚意和尊重回报你，毫无保留地向你掏心窝子，确保你“抓到活鱼”。做记者如此，做其他工作也概莫能外。

“见官低半级”，体现的是一个人的谦卑的精神。谦卑与卑贱不一样，谦卑，是一种谦虚而不自高自大的姿态；卑贱，则是一种卑鄙下贱的行径。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谦卑，之所以为人道说和拥趸，是因为谦卑之人总是以仰视的方式对待人，总是敞开真诚的胸怀打动人，总是以友善的态度接纳人，因而，在双方的良性互动下才有了一个个精彩的瞬间，才留下了一段段佳话。

解放前，戏剧大师梅兰芳在一大戏院演出京剧《杀惜》。剧场内戏迷们喝彩声不绝。可一位衣着朴素的老人，摇着头说“不好！不好！”梅兰芳感到有些蹊跷。戏一下场，他来不及卸妆更衣，就用专车把这位老先生接到家中，待如上宾。用茶毕，他恭恭敬敬地说道：“说吾孬者，是吾师也。先生言我不好，必有高见，定请赐教，学生决心亡羊补牢。”见梅兰芳如此谦逊诚恳，老先生终于直言不讳：“惜娇上楼和下楼之台步，按‘梨园’规定，应是上七下八，博士为何八上八下，请问这是出于哪位名师所传？”梅兰芳恍然大悟，深感自己的疏忽。此后，凡在当地演戏，他都要请这位先生观看并指正。梅兰芳成为一代戏剧大师，是否缘于其“见官低半级”的谦卑，源于其对观众的尊重，对艺术的敬畏呢？

托尔斯泰说过：“一个人就好像是一个分数，他的实际才能好比分子，而他对自己的估价好比分母。分母愈大则分数的值就愈小。”在自高自大的人眼里，永远只有他自己而没有别人，他总认为自己什么都懂，别人什么都不懂；自己是神仙下凡、孔明再世，别人只是阿斗一人、笨蛋一个。殊不知，在群众面前，自己渺小得很，自己浅薄得很。唯有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离开群众的真心拥护，失去群众的全力支持，我们终将一事无成。从这个意义上说，做到“见官低半级”，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也是一种智慧、一种境界。

是啊，真知灼见就在群众中，群众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力量。“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发掘和汲取群众智慧的“源头活水”，自要求我们“见官低半级”而敢于放下身段，勇于承认自己的不足，甘于眼睛向下，自觉地把群众当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事实上，你越是做到“见官低半级”，群众越是在乎你，越是会高看你一眼，越是会把你当自己人，从而呼应你，配合你，甚至跟着你、顺从你。

“见官低半级”，既是一种工作方法，同时也是一种学习方法。其实，任何人的发展，都离不开通过学习而积势蓄能，就好比树木的成长需要树根通过无数的根须向土壤要营养一样。对人而言，学习的方法可以有很多种，但最有效最生动的方法之一，便是要树立起“见官低半级”的观念，说到底这既是走进广大群众内心，从群众身上获取养分和能量的捷径；也是走入知识殿堂，充盈底气、武装自我的捷径；更是走向广袤的实践天地，得到全身心的锻炼、获得全方位提升的捷径。

“见官低半级”，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而难就难在面子上。有的人地位低的时候能够做到，而且做得很好，可随着官越做越大，便以为再这样做就意味着掉身价，挂不住面子，于是，在长脾气忘记性里，不免有意无意地丢弃了“见官低半级”的做法；有的人一旦取得了一些成绩，获得了些许荣誉，便从此沾沾自喜，以为高人一等，以至渐渐与“见官低半级”告别。想起当年毛主席《关于诗的一封信》在《诗刊》上发表不久，北京大学有位学生给毛主席写信，说信上那个“遗误青年”的“遗”字，应该作“贻”。毛主席看到这封信非常高兴，特地向《诗刊》编辑部负责同志打招呼，请他照北大这个学生的意见加以改正。毛主席的地位够高的了，毛主席的学问也是够大的了，然而，他“见官低半级”而欣然接受北大一位学生指错建议的谦虚谨慎之态、豁达宽宏之心、即知即改之行，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随 笔

习总书记的“焦裕禄之问”

□张大伟

半个世纪前，一篇由新华社著名记者穆青撰写的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随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传遍神州大地，人们记住了焦裕禄这个名字，了解了他的感人事迹。半个世纪过去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兰考考察时深情地说：“焦裕禄同志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我们能为后人留下些什么呢？”他的这句“焦裕禄之问”，值得我们每个党员干部深思。

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时代变了，党和政府需要各类具有新思路、掌握新技能的“知识精英”，以前那种老传统、老作风过时了，不管用了。然而，我们在现实中看到过这样的党员干部：他们有招商引资、圈地造城的大手笔，却很少顾念当地文化的传承、环境的保护；他们有刺激GDP数字不断提高的洋办法，却对老百姓柴米油盐、衣食住行这样实际问题不管不顾；他们对上马各种形象工程最热衷、最起劲，却不惜把一堆“硬骨头”“烂摊子”留给下一任；他们忙于用职权为配偶、子女、亲属捞好处，却对老百姓的埋怨声、咒骂声置若罔闻。我们要问，这样的干部也算是在官场上走了一遭，但究竟有多少人民群众会记住他们的名字？这样的干部也曾取得过一些所谓的“政绩”，但究竟能否真正经得起时间、实践和人民群众的检验？

这次群众路线教育活动的主题是“为民、务实、清廉”，目标是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要真正反掉这“四风”，就要以焦裕禄公仆情怀、求实作风、奋斗精神和道德情操为镜，多想想我们到底该为后人留下些什么！如果真这样想的话，也许会自觉地多一些“充电”培训和调查研究，少干一些遭后人耻笑或痛骂的蠢事。如果常这样想的话，也许会自觉地减少一些铺张浪费和奢侈享受，多给后人留一点可供持续发展的资源、能源和文化遗产。

再次踏上兰考的土地，我们看到沟渠成行、泡桐成林、粮食高产，曾经困扰这里的内涝、风沙、盐碱等“三大灾害”已经一一克服，曾经贫瘠无比的土地成为人们安居乐业的一方沃土。还不仅于此。当初，由于儿子焦国庆看“白戏”，焦裕禄曾专门召开家庭会议，要求子女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搞特殊化。如今，焦家第三代的10个孩子中，有一半人都在打工，没有一个人依托父亲的名望去找关系、走捷径。半个世纪过去了，他们仍保持着淡泊名利、自强不息的家风，继续传递着可敬的正能量。焦裕禄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多么丰厚的精神财产！

早在180多年前，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就写道：“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实现伟大民族复兴，需要一代代共产党人怀着“功成不必在我任期”的胸怀，埋头苦干、薪火承传地不断奋斗下去。这需要不断增强党性修养，耐得住寂寞和清贫，经受住委屈甚至误解。这才是对习总书记“焦裕禄之问”最鲜明、最准确的回答。

（作者单位：上海松江区委党校）



湖南省委党校综合楼

校园风光

刊址：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 电话：（010）62805132 邮政编码：100091 订价：全年88元 订阅：本报发行部 发行部电话：62806227 照排：学习时报社 承印：人民日报社印刷厂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海工商广字0301号